

带着民意上两会 饱蘸感情诉民情

在全球化、知识经济、科技革命的浪潮冲击下,社会形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矛盾凸显,风险社会临近。在基层,这些矛盾尤为明显。如何化解基层存在

的各种矛盾。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饱蘸感情,广泛听民声、察民情、集民智,把百姓的真实诉求带进“两会”。

全国政协常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郑小燕:

儿童用药安全亟待加强

儿童尤其是婴幼儿,本来就是一个特殊群体,用药需特别谨慎。但由于用药方面的种种问题,导致大量病儿面临危机。有关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儿童药物不良反应率是成人的2倍,新生儿更是达到4倍。

“儿童用药安全绝不仅仅局限于儿童本身,而是关乎整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甚至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因此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已经成为民生热点问题。”有医学专业背景的全

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副主席郑小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无忧虑地说:“目前儿童安全用药存在专用剂型严重不足,成人制剂缺乏儿科临床实验基地、儿童药物不良反应严重等多个问题。”郑小燕给记者提供了一组调研数据:在我国,儿童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约为12.9%,新生儿24%,而成人是6.9%。我国每天有520人死于不良用药,其中儿童占32%。我国聋哑儿童中,抗生素引起的药物中毒性耳聋已超过百万,每年新增3万人。惨痛的教训包括沙利度胺致“海豹肢畸形”

婴儿、氯霉素致“灰婴综合征”等,其他诸如扑尔敏易致儿童烦躁、新霉素滴耳剂可致婴儿听力受损、滴鼻净可引发小儿中毒等,也都让家庭和社会付出难以计量的代价。其他,诸如激素滥用导致儿童发育迟缓、骨质疏松、免疫功能下降;维生素A过量可致厌食、呕吐等;维生素D过量可引起腹泻、肾脏损害等;维生素C过量可引起腹痛、腹泻等;过量服用诺氟沙星而出现四肢震颤、抽搐、

伤及中枢神经、肾脏。

为此,郑小燕希望关于儿童安全用药的提案能得到业界更多的支持与关注。

她建议,鼓励制药企业生产儿童专用药物和制剂。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于儿童专用药物或制剂的研制予以优先立项资助,在相关政策上给予倾斜,如生产儿童专用药的企业可以被政府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使之做大做强。同时也为实现世卫组织在2007年提出为儿童“量身定制”药物的目标贡献力量。

建立儿童药理基地,健全儿童用药临床试验制度,帮助生产企业较快的通过儿童药物临床试验。

将儿童专用药物或制剂纳入医保。目前现有的儿童专用药物或制剂大多不在医保之列,不能报销,不仅影响儿童用药安全,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企业的生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市居民医疗保险,本意就是包括了儿童的医疗服务内容,儿童专用药物不在其中,既不符合政策,也不符合情理。

放宽儿童专用药物和制剂招标限制。儿童用药要求适合儿童特殊体质及需求设计,利用矫味剂来改善人口味道,提高小孩的接受度,同时要在包装内附有剂量刻度的量器或喂食器或包装不易被儿童打开,安全、方便,又让家长方便掌握剂量。儿童用药开发、生产成本高,利润低。人们对儿童药品的价格常有误解,认为儿童药物的含量是成人剂型的几分之一,儿童药价格也应该是成人药的几分之一;其实,在药品生产过程中,原料药所占的比重并不大。

在美国,儿童被分为2岁以下、2~6岁、6~12岁三个阶段。不同时期孩子对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能力都不同,儿科疾病的药物治疗比成人要复杂得多,应根据不同时期孩子特点和具体病情确定治疗方案和不同剂型的要求。因此建议:一是招标药品中应有相应的儿童规格或剂型,对已有不同年龄段用药规格和制剂的药物,应兼顾不同年龄阶段对不同剂型的要求特点。二是在儿童专用药品招标过程中应有一定的政策倾斜和一定的药品利润空间,才能维持可持续发展。三是加强医院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对相应的儿童规格或剂型的认识,减少由于用量少、利润低等人为限制,有的领导假借“一品两规”为由将儿童用药拒绝进药,建议规定每个医院最少应有儿童规格或剂型的药品数量作为考核指标,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正确对待“一品两规”的规定。由于儿童用药的复杂性和年龄阶段性,因此儿童用药存在不同的剂型和规格,如口服制剂就有可能包括滴剂、口服液、不同剂量的片剂、分散片、缓释片、控释片和胶囊等。目前对“一品两规”中的“品”理解各不相同,有人认为一品就是某种药品,包括口服制剂和针剂,有的人认为口服制剂算一个品,针剂又算一个品,还

有人认为不同的剂型就是不同的品,也有的人认为同一剂型中的不同规格也属于不同的品,不少医院药剂科主任和院领导也分不清楚哪种看法是对的,又怕踩上“一品两规”的红线。这在客观上导致儿童用药即使中标也很难进入医院的尴尬局面。建议:一是卫生厅对“一品两规”能够做出权威界定并予以公布;二是儿童专用药品可以不受“一品两规”的限制。

县级以上医院必须设立独立的儿科门诊和病房。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卫生合作中心表示,目前全球5岁以下儿童每年死亡数高达1000多万,而其中2/3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根据不同时期儿童特点和具体病情合理治疗是进一步降低儿童死亡率的重要措施。内科医师看儿科,把儿童当作成人的缩小版,无法真正掌握儿童合理用药。药物在成人身上的轻微副作用,在小儿身上可能就是毒性反应。儿童药物的药效和药动力学规律与成人不同,存在不少潜在风险。只有经过培训的儿科专科医生才有可能正确选用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剂型和剂量,提高儿童疾病的救治水平,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产生。

她认为,中医儿科验方诸多,具有开发新药物的坚实基础。中医荟萃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小儿养育和疾病防治的丰富经验,形成了诸多的儿科验方。南北朝时就有王未钊的《小儿用药本草》和徐叔响的《疗少小百病杂方》。隋代巢元方主持编撰《诸病源候论》,其中论小儿杂病诸候6卷。北宋钱乙被誉为“儿科之圣”,其弟子阎季忠编集的《小儿药证直诀》对中医儿科治疗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北宋董汲的《小儿斑疹备急方论》;无名氏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陈文中的《小儿痘疹方论》和《小儿病源方论》;元代曾世荣《活幼口议》和《活幼心书》;明代,有薛铠、薛己父子的《保婴撮要》,万全的《幼科发挥》、《育婴秘诀》和《片玉心书》,鲁伯嗣的《婴童百问》,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幼科》,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小儿则》。清代,有集大成的《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夏禹铸的《幼科铁镜》,谢玉琼的《麻科活人全书》,陈复正的《幼幼集成》等。这些中医古籍中都有大量的常用方剂,用以开发儿童用药,确实是一座巨大的宝库。



白衣天使进校园

3月7日,浙江嘉兴中医院医生给安宁小学的学生检查身体。当日,嘉兴市中医院的医护人员来到当地农民工子弟学校——安宁小学,义务为孩子们检查身体,并送上全院女医务工作者捐赠的少儿读物和学习用品。

新华社发(王超英 摄)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临沂市委书记张少军:

“要把农村的资金留在农村”

“只要把农村资金大部分留在农村,就能有效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谈到当前农村金融难题,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临沂市委书记张少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推广村镇银行、引导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和大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合作,把资金留在农村,是破解农村金融难的可行办法。”

作为山东省的农业大市,临沂市农业人口超过870万人,耕地超过1000万亩,农村金融畅通与否至关重要。

张少军认为:当前基层农村不受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青睐,银行网点越来越少,扶持农村经济发展大多只靠农村信用社“孤军奋战”,金融支农问题十分突出。

张少军说,一方面虽然农村信用社在农业贷款方面作出很大贡献,但仅此一家也带来不少问题,“利息偏高,贷款总量供应不足”;而从另一方面看,民间资金也没有好的出路。

破解农村金融难题,应加快村镇银行的建设步伐。张少军认为,村镇银行建设步伐太慢,临沂目前仅有3家村镇银行,规模很小,远远满足不了要求。他建议,应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牵头组建村镇银行,规范管理,吸纳当地存款,有效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引导发展小额贷款公司,也是破解农村金融难的一种有效手段。张少军代表称,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有效利用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闲置资金,既将闲置资金纳入规范平台,又能比较好解决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而且不吸收存款,金融风险能有效控制。“这种形式很适合农村现状,但现在数量太少,推广力度小。”

大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效开展信用合作,则是破解农村金融难的一条基本途径。张少军强调说,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当今农村发展中的地位已越发重要,这是增强农业经济效益、走适度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平台。仅临沂当地就已达12000家,其中已有一部分在探索开展信用合作模式,成效可喜。

据他介绍,在生产经营合作的基础上,这些种植、养殖等专业合作社农民们把资金集中到一起,在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合作,利率很低,仅限于内部,不对外借贷,也不吸收存款。“合作社的农民相互知根知底,信用一目了然,这种信用合作有着广阔发展空间,国家应该大力支持。”

张少军指出,满足农村资金需求,光试图把城市资金吸引到农村,这不太现实。“把农村资金留在农村,这才是破解农村金融难的有效之道。”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莱阳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宫学斌:

农民需要更先进的信息技术

“现在的农民已不再满足于仅仅打个电话了,还需要更先进的技术和更丰富的信息。”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山东莱阳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宫学斌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说,近年来,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确实起到了桥梁和导航作用,为农民群众

增收创富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和广泛的交易平台。

“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信息入村入户难,工作机制不健全,人员配备不足等。”他表示。

他提议,要确保建设经费充足。由于信息化建设经费不足,阻碍了服务机构工作的有效开展。只有确保经费充足,才能

保证信息基础设施到位,为农民及时获取各种农业信息奠定基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制定相应的工作任务,做到专人专管。在保证信息质量和时效性的前提下,奖惩结合,对工作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反之,则予以处罚。要组织信息化知识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强化农民了解信息、获取信息的意识。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

发展文化旅游 要抓住青少年的心

“好奇、好玩是孩子的天性,不好玩就不是孩子,不好奇的孩子对什么都不会感兴趣,便什么都不想学。所以传统的观瞻兼说教式的旅游如今已满足不了孩子们的需求。”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创新文化资源利用方式,发展我国的文化旅游,必须围绕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这根主线,特别是抓住引导和教育广大青少年,满足其好奇、好玩、娱乐等需求这个重点。

他说,要通过创新文化资源利用方式,使文化旅游各种项目从形式到内容及表现、游乐方式等,都适应他们的需求,对他们充满吸引力,让他们通过文化旅游纵情玩乐,释放情绪,舒缓压力,调整身心,激发求知欲,获得想要的知识,喜爱中国文化。

“抓住了这根主线,文化旅游就能充满吸引力,就能做大做强。反之,无论你谋划得如何头头是道、沾沾自喜,无论你的园子多么规模浩大,内涵如何丰富,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们喜爱,都将是得不偿失的。”同时,他还提醒相关单位:“要

从对国外模式的照搬和模仿中跳脱出来,走自主创新的中国特色的文化旅游之路。”

他在接受采访时还痛批国内竞相兴起的科技型主题公园:“布局不合理,同质化现象严重,基本上走的都是仿迪斯尼之类国外的路子(从建筑外型到项目内容),甚至不乏照搬迪斯尼乐园的例子(香港、上海)。照搬和模仿,不仅无法利用好我们的优势资源,影响我们创造力的提升,无法做大做强我们的文化旅游,而且如果我们的青少年自小就深受这类主题公园以及国外动漫、影视作品等所传播的西方文化、思维模式、审美情趣及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那么必然会导致他们自觉亲和西方、排斥传统,甚至最终成为被和平演变的一代。我们必须从国家文化安全和产业发展后劲的战略高度,抓紧改变目前这种现象,走优势或特色资源+创意+科技以及各种新方法、新手段的路子,走自主发展的中国特色主题公园之路。”

他认为,创新文化资源利用方式,决不能随意改变文化资源的真实,否则就会误导游客和观众,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使文化传统及传统价值

乃至现实文化价值观错乱,其贻害绝不可小视。而且这类文化旅游景区(点)也决不会长久。

他举例说,在利用文物遗址创新资源利用方式时,必须首先通过保护措施,使遗址的文化内涵得以完整保护和科学展示,然后在其建设控制地带之外运用新的创意,结合新方法、新手段,使遗址所蕴含的生产生活、民情风俗得以再现,供游人观瞻、体验、娱乐。

再如,在创新历史名人文化资源利用方式发展文化旅游时,必须真实再现该名人的生平事迹及其背景文化,包括需要反映的建筑、器具、服饰等都不能错乱。又如,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表演、展示(表演艺术、传统技艺等)时,都必须确保其原真,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创新。在确保文化资源原真的基础上,利用新的创新的手段进行创新,可以使文化旅游出现新天地,可使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传承、创新、推广,带来新“产业”,可使许多已受冷落的文化旅游景区(点)焕发新春,成为热点,从而带动一方民众致富。这在国内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范例。

李修松建议,国家和地方及时出台创新文化资源利用方式,加快文化旅游发展的法规、政策,并创新体制机制。一是加强创新文化资源利用方式,走自主创新文化旅游之路的研究。二是加快培养具备较为广博的知识、懂科技、善创新的人才,并且推动国家和地方形成人数越来越多、层次越来越高、创新力越来越强的专家队伍,组建适应文化旅游创新发展的多样化专家团队(必须是具备相应的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等知识的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的创新团队)和创新平台。三是以文化部与国家旅游局合作发展文化旅游、文化部与科技部就文化与科技深度结合,从而促进相互发展为引领,推动各省市文化与旅游部门、文化与科技部门开展相互合作,从体制、机制、制度上促使文化与旅游、文化与科技的深度结合。四是通过制定相关法规、政策,对各地创新文化资源利用方式,走自主创新文化旅游之路,进行财税、融资、奖励及项目等方面支持。